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分为前委、工委与后委。后委在其存续的一年时间里,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王震曾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

# 党史上仅存在一年的中央后委



##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分为三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中共中央指定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驻延安各机关的撤离。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需要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

29日,中共中央转移到清涧县的枣林沟村,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一

部分去太行,一部分就地疏散。4月11日,中央又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将在晋西北的5500多人分成3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人暂留在原地不动,组成由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至此,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后委正式形成。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余人,他们主要来自军委作战部、军委总卫生部、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中央办公厅、情报部等单位,此外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托儿所的妇女和小孩。上述机关统一合并为中央后方委员会,后委领导机关驻扎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

## 是中央指挥全国战场的耳目

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叶剑英要求情报部门将每天收集的情报,编成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他还指示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每3天或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情报,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一个全军的情报网。

中央后委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沟通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讯联络。1947年4月29日,中央决定:在叶、杨

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电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并通告各地。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绝大多数通过后委大电台。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电台联络,后委成了中央、军委与各战略区以及地下党的联络纽带。当时做了许多迷惑敌人的动作,例如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胡宗南部队曾侦测得知广播电台在太行山,一度误以为毛泽东到了太行山。

## 承担人员及物资的中转任务

后委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承担着为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的任务。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输送到陕北前线,后从他们中挑出600人补充入中央纵队警卫部队。后委还组织临县民工4000余人运送粮食5410石、被褥近万套,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

后委所在的临县是军火生产的集中地。当时,迁建在临县的军工厂有5座,工人2000多人,所生产的军火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陕北解放区的战斗。

总之,中央后委实际上是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部与总参谋部。

## 中央三委会合西柏坡

1947年底,解放战争进入一个转折点,西柏坡成为理想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当中央前委有东移的意向后,后委领导人随即意识到中央后委应该提前做好情报、通信的准备工作。1948年1月20日,当周恩来和任弼时关于中央前委东移的正式通电发出时,后委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机关大迁移的前期准备和部署工作。

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电报的指示,中央后委的迁移于3月中旬开始。4月22日,杨尚昆率领后委机关最后一批人员到达西柏坡。

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机关来到西柏坡。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与中央后委先后会合于西柏坡之后,这3个在特殊时期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据《文史天地》)

## 郭潜:敌特中职务最高的中共叛徒

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在军统局做了戴笠手下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数十年的国共斗争中,安排中共叛徒做特务,也是国民党方面的常用手法。这些做了特务的叛徒,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特务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惟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郭潜。

### 曾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

郭潜,祖籍广东梅县丙村镇。长征结束后,他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在此期间,郭潜曾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

1938年1月,中央抽调郭潜在内的100多名干部随同张云逸前往南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东南分局秘书长。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江西省委成立,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1940年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一年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由福建调来谢育才接替原来的工作。1941年7月,谢育才到达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时,发现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都遭

到了破坏,但在此前郭潜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没反映这些情况。

1942年5月26日,郭潜被中统特务逮捕,随即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并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逮捕了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

### 成为中统局“中共问题专家”

在完成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中统头子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这个谣言没有奏效,郭潜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这些工作,郭潜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

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员通讯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 指挥特务破获在台地下党组织

1948年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担任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经过精心策划,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郭、沈二

人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赴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了特务头子。

### 变身“学者”攻击中共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当副主任。他改名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是国民党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专门研究大陆问题。

1969年,作者署名为郭华伦的4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大量采用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而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这本书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

郭潜凭借着“学者”身份,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只是到了晚年,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

(据《世纪风采》、《名人传记》)